

世界文学名著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现当代系列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王 燎 译

人生舞台



ИГРА

书馆



译林出版社



ИГРА 人生舞台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王 燎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 名 人生舞台
ИГРА
作 者 [俄罗斯]尤里·邦达列夫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译 者 王 燎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书出版 《НОВЫЙ МИР》1·2·1985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淮阴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地址:淮海北路 44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697—6/I·397
定 价 10.8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人生舞台》讲述的是一个忧伤的故事。

才华横溢的莫斯科大剧~~院~~伊琳娜，应著名电影导演克雷莫夫聘请，在一部影~~片~~饰演主角。但是摄制工作起步伊始，伊琳娜竟在一片诽谤声~~中~~，而横遭诬陷的克雷莫夫也在四面楚歌中离开了人世。

《人生舞台》是一部针砭~~时弊~~、解剖人生、透视人类灵魂的社会哲理小说。通过两位艺术家的悲剧，小说提出了苏联社会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通过蒙受不白之冤的克雷莫夫的反思折射出来的。主人公那愤世嫉俗的激情和对苦涩现实的哲理探索加强了小说的批判力量，并把社会精神生活与道德问题提到首位。

首先使克雷莫夫惴惴不安的是，逼死伊琳娜，接着又把他诬为罪魁祸首的那个“社会环境”和构成这一环境的人物。这个“社会环境”曾使他成为蜚声国际影坛的导演，而构成这一环境的人们几十年来也曾同他朝夕相见，相安无事。而现在，克雷莫夫看到的却是落选的影星们到处告状，散布流言蜚语，把伊琳娜说成是他的情妇；自称是克雷莫夫的“忠实奴仆”的制片主任莫洛奇科夫则伙同摄制组司机古林诬告他，说他逼死了伊琳娜；而电影制片厂厂长巴拉巴诺夫和电影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佩斯卡廖夫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默许了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克雷莫夫终于意识到，在这个强大的“环境”面前，他是多么渺小无力和孤立无援。

巴拉巴诺夫的办公室似乎是这个“环境”的象征。在这里，从巴黎国际电影节载誉归来的克雷莫夫得知，他不仅被剥夺了拍摄影片的权利，而且将作为嫌疑犯应随时听候内务部的传讯。在这间办

BAG 43/07 06

公室里，电影界最高领导者之一佩斯卡廖夫只用三言两语就否定了克雷莫夫一生的创作成就，而蝇营狗苟的莫洛奇科夫却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悲痛欲绝的伊琳娜的老父受人蒙蔽而向内部部提出了严惩克雷莫夫的要求。承办此案的大尉，显然是从上级得到暗示，竟肆无忌惮地对克雷莫夫采取诱供手段，以便把他送上绞刑台。

显然，自私和冷酷的官僚主义者是这一“环境”的主要支柱。作家强调，新官僚佩斯卡廖夫首先从旧官僚那里继承了某些特点，如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捍卫者，是一切方针政策不容置疑的唯一的解释者；他们为了取得高官厚禄而臆造艺术界的虚假繁荣。然而，新官僚又不同于旧官僚，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行事比较谨慎，办事手法更为狡猾。他们善于玩弄政治术语，反对推陈出新；往往不是评论作品本身，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作者个人，用歪曲事实的手法否定作品的艺术探索和创新。例如，佩斯卡廖夫指责克雷莫夫说：“您这部描写当代青年的剧本有那么多反思，向自己提出了那么多问题，有那么多彷徨，以致第一，这不符合事实；第二，人们看了这部电影就永远不愿意到……比如西伯利亚去参加建设了。”克雷莫夫的挚友斯季绍夫说，在这种人领导下，“庸碌无能的人日子最好过，因为他们老实听话，不冒风险。”克雷莫夫的助手叶尼亚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想丢掉饭碗，不想失去面包抹黄油的生活……他们每个人都用双手死死地按住沙发椅，用牙咬住办公桌！而且所有这些人都是外行！”

巴拉巴诺夫是一个用漫画手法描写出来的官场上的两面派人物。在克雷莫夫处于荣誉顶峰时，他极尽逢迎讨好之能事，把自己打扮成善良的长者；一旦克雷莫夫陷入困境，这位官僚主义者便露出了狰狞面目。他甚至昧着良心提供假证，落井下石陷害别人。然而当美国导演格里奇马尔提出同克雷莫夫合作拍摄影片《最后的海龟》时，巴拉巴诺夫又抬出了这个“嫌疑犯”而加以利用，不过他

的目的只是想自己乘机到美国逛逛而已。在巴拉巴诺夫眼中，艺术家不过是他以权谋私的工具。

但是在克雷莫夫看来，佩斯卡廖夫和巴拉巴诺夫都是道德上“发育不全的人”，因而他们成了“生活的破坏者”。他们的自私和冷酷达到了可怕的程度，但是他们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人，归根结底，他们也是“不幸的人”。克雷莫夫认为，在当代世界上，“一个人与别的人、与世界上的一切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像一张网，谁也挣脱不出去”，“坏人和好人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因此，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办法来解决。

在《人生舞台》中，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全球性问题，如战争与和平、生态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东西方和平共处和意识形态斗争等问题，都是从克雷莫夫的道德探索的角度提出来的。主人公是把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同人类在不同时代都会面临的永恒问题，诸如人生的意义、世界的前途、人对真善美、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等等结合起来思考的。因此，克雷莫夫的道德探索的哲理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

什么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呢？这个问题在克雷莫夫之前，邦达列夫的小说《岸》（一九七五）和《选择》（一九八〇）的主人公们已经提出来了。作家尼基金、画家瓦西里耶夫同《人生舞台》中的美国电影导演格里奇马尔都说过，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核战争。然而克雷莫夫却对这个常识性观点不完全赞同。他对格里奇马尔说，即使不发生世界大战，人类也可能在物质享受的诱惑下而毁灭于道德沦丧。他认为，世界性的道德危机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

克雷莫夫还认为，世界性的道德危机的发源地是资本主义世界，是以美国生活方式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他在同格里奇马尔辩论时，以咄咄逼人的口吻数说着西方文明的种种罪状，指责它“给全

世界带来精神堕落”，是“禁锢生活和智力的集中营”。克雷莫夫相信，只有“俄罗斯体现着世界的良心”，只有它才能“拯救迷失了方向”的人类文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克雷莫夫的反思中，精神与道德堕落现象已不再是西方世界独有的了。他在自己的国家中也发现了“道德水平下滑”的趋势。他承认：“我们并没有被水泥墙隔绝开来”，“善的王国是有边界的，而恶的表现是没有边界的”。他惴惴不安地自问自答：“为什么没有出现完美的局面？……最正确的答案是：迄今我们未能堵住漏洞。”

这个“漏洞”显然不仅指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到“善的王国”里来的通风口，它也是这个王国本身固有的种种弊病，是它迄今尚未解决的种种矛盾冲突、是历史和现实长期形成的那种“环境”使然。因而，克雷莫夫力图在自己的周围，在自己身上，在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们身上，即在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灵魂深处寻找产生“世风日下”的原因。他认为，社会风气的逆转开始于“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从那时以来，“温饱生活和物质福利的诱惑未能使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变得更好些。这是谁的过错呢？是我们大家。我们太热衷于追求轻松愉快的生活，而忘却了主要的东西——为什么生活……”

克雷莫夫从制片主任莫洛奇科夫身上痛心地意识到，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的艰苦年代，人们“对手足情谊的希望不知不觉中逐渐被渴求物质利益所代替”了。他在莫洛奇科夫的言行中看到的不只是个人之间的爱憎恩怨关系，他还看到了支配此人行动的社会因素：在目前社会发展阶段，人与人之间在才能、地位、金钱方面还存在着差别；某些道德上“发育不全”的人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攫取更高的权力。克雷莫夫是这样谈到苏联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现象及其后果的：“从居民大楼的管理员到部长，他们都宣传一个原则：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日后洪水是否会淹没人类。人们在无情地砍伐森林，把江河变成

污水沟，把天空当做垃圾箱。这些人才是大地和一切生命的刽子手。”

克雷莫夫也无情地剖析着自己：“我的生活目的又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我明确地知道这一点吗？……我的愤世嫉俗也是一种调和折中，也是屈服于环境，归根结底也就是背叛自己。”他也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种种病态现象感到内疚，他说：“我们还没有克服自己的奴性”，“我们大家都是环境的俘虏”。

克雷莫夫还发现自己对西方世界的看法有片面性，他的这一反省在当时的苏联文学作品中还是罕见的现象。例如，他陪同美国导演格里奇马尔参观教堂时，曾对这位美国人的宗教情绪十分反感。但是克雷莫夫反问自己：“是谁给了我这个权力？……我们多么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理想的人、毫无缺点的特殊人物啊！……”“这个傲慢的人自幼就养成了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情绪，当然啦，他过着天使般纯洁的生活，当然啦，他什么都懂，而且对一切都有绝对透彻的理解……”克雷莫夫的儿子瓦连京挖苦这种人是“过着自己想象出来的生活”的、“在教条主义下培养出来的拿破仑”。克雷莫夫甚至认为，美国的和平主义者格里奇马尔在精神与道德方面比伪君子巴拉巴诺夫高出一头，这个美国导演比苏联电影制片厂厂长更使他感到可爱可亲。

在克雷莫夫的反思中，文艺界的种种弊端占有重要地位。他曾对伊琳娜说：“……在一定时期内，文艺界还要被两位女王统治着，这就是对别人成就的羡慕和对别人才能的嫉妒。而且任何道德革命也无法把这两位女王赶下宝座。”

嫉贤妒能、派系斗争、相互排挤、四分五裂这些文艺界的负面现象给一些本来不配进入艺术殿堂的人们带来了好处。他们“大摆宴席”，自吹自擂。斯季绍夫说，今天的文艺界已经没有偶像和天才，也没有真正的流派了。“谁也不需要艺术权威，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

然而，克雷莫夫的信条是：“善于工作的人终将取得胜利”。作者是这样评价克雷莫夫的：“饱经世故的他，对左的和右的狡猾实质已经看透了。因此，他既不想成为左派，也不想成为右派，更不想成为受人驾驭的人。他力求采取的也许是有些过于坦率和过于温和的态度……”

在《人生舞台》中，克雷莫夫只是提出问题而已，他并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又在顽强地追求着理想的王国。这个王国忽而是他童年时代的故乡，忽而是他青年时代访问过的俄罗斯古老城镇，忽而是奥地利那个充满阳光、爱情和幸福的“小广场”。他在托尔斯泰晚年日记中发现了“激动人心的信仰”，而那不过是通过博爱精神走向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他在“佛祖的天国”里看到的是静思、宽容、坦荡、淳朴而又自然的生活情趣。但是，他更向往的是唐吉珂德精神和殉道者阿瓦库姆为信仰而献身的高尚情操。在临终时刻，克雷莫夫想的是再回到人间一次：“去找痛苦、找奥莉加和她那一对安详的眼睛，找那逗人爱的塔尼娅，找巴拉巴诺夫、莫洛奇科夫，找所有作恶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过是一些不幸的人……”

邦达列夫是一位政治上敏感、艺术上勇于创新的作家。五十年代，他的小说《先头营请求炮火支援》和《最后的炮轰》是公认的“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而《热的雪》则开辟了七十年代军事题材“全景文学”的新途径。七十年代以来，他连续发表了《岸》、《选择》和《人生舞台》、《诱惑》四部小说，力图通过作家、画家、电影导演、科学家这四位知识分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近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揭示苏联和西方世界在冷战时代前后面临的种种课题，剖析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人们的复杂精神生活。在他的新作中，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都扩大了，思想容量增加了，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更富有哲理内涵。

邦达列夫的创作风格特点是充满激情和真诚。与此同时，托尔

斯泰的“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现实主义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手法对他有很大影响。尽管他的激情有时失于偏颇，但是他一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捍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

邦达列夫是一位思想家类型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人物体系、情节结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和假定性手法都是为了论证作品的思想主题，因而往往留有斧凿的痕迹。他的下述一段话很能说明他的艺术主张：

“艺术——这是一种陶醉；这是黑与白的原素；是魔法；是上帝同魔鬼的争斗；是第二次生命；是揭示可笑的与悲惨的事物；是肯定与否定；既是否定不道德的道德，又是产生道德的不道德；是揭示内容的形式；是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既是人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又是人的自我追求和自我意识。归根结底，艺术——就是历史的历史、是个性的历史。”

人们对邦达列夫表述的观点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保留，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这是一位直言不讳、胸怀坦荡的语言艺术大师、一位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国家融为一体的艺术家。

王 燎

一九九七年一月三十日

第 一 章

出租汽车离开飞机场以后，一路上克雷莫夫觉得很不舒服，他的两鬓沁出了汗珠，憋得慌，衬衣硬领紧贴在汗淋淋的脖颈上。他几次摇开车窗，头靠在后座椅背上，希望能轻松些。但是，仲夏的穿堂风充满汽油味，热乎乎地吹拂着他那汗湿的面颊。

他朦胧中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的时刻，公共汽车站和商店一带竟有这么多无所事事的人来来往往（他们什么时候上班呢？）。他看到，早晨的阳光在树叶上、在玻璃窗上闪耀着，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旋转木马般的异国街道、橱窗、人行道上红色太阳伞下荫凉处的小餐桌、穿着五颜六色、花花绿绿衣服的异乡人群、一大早就很炎热的异国的太阳。这个光怪陆离的旋转木马好像在噩梦中一样，高傲地抹去了朴实的莫斯科街景，用什么东西贬损了它。而这些街景却使刚从国外归来的他既伤感，又动情。然而，他感到不快的是，以往从国外归来，他从未有过嗓子憋得难受的病态感觉，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想大哭一场的人，由于没能哭出来而十分难受那样。他也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他倒想自我嘲笑一番，对自己这种毫无来由的感伤情绪表示蔑视。

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个好客的巴黎一切都很顺利——度过了热闹而又忙乱的六天国外生活，参加了一些轻松愉快的宴会，在有空调设备的电影放映厅里观摩影片，出席了各种酒会、讨论会，在香气扑鼻、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消遣，那里有天鹅绒沙发椅，舞台上苍白的女人肉体；他每天早晨仔细地刮脸，每顿早餐喝两杯咖啡，这使人精神抖擞，然后就去观摩影片；最后就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的令人敬慕的导演奖。在电影节期间，万事如意，

大家都以礼相待，然而这段愉快而又忙乱的国外生活却留下了不想去回忆的、令人痛心和羞愧的心情。

他闭上眼睛，力求作好精神准备，适应原来的莫斯科生活，适应这种生活的习以为常的节奏。在这种生活中，依旧是制片厂、艺委会、拍摄影片的准备工作。然而，不知为什么，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于是他想：“我是提前回国的，我得先在家里休息两天。”

但是，当他乘坐的出租汽车驶近位于列宁大街的住宅，接着汽车驶进杨树树荫下的庭院的时候，当他下了车，走进凉爽的石门洞，上了被磨得陈旧的电梯，随后又看到了熟悉的楼梯口和包着褐色人造革的家门以及门边的音乐门铃按钮的时候，他仍未摆脱想大哭一场的焦躁不安的心情。他只好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以便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他在按钮上按了四下（这是家里人用的暗号），留心听了听，又按了四下，指望听到门后妻子、女儿或儿子的声音，但是门后是一片寂静，从空无一人的住宅里只传来了模模糊糊的簌簌声，看来，谁也不在家。

“爱妻和娇子用幸福的拥抱欢迎我。”他冷笑着想道。

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把手提箱放在过道里，闻到了一股暖烘烘的尘土味。他在镜子里看见了满面倦容的自己。他突然觉得，自己这是意外地走运了。是啊，他太累了，多么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不必说话，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地松弛一下，还可以翻翻杂志，浏览一下报纸，读一读他不在家时收到的那些信件。

他脱掉上衣，到各个房间转了转。显然，全家都到别墅去了。闷热的住宅里，所有的窗子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帘垂挂着，找不到一个不闷热的角落。太阳的光线透过窗帘缝隙照在镶木地板上、地毯上和家具上，厨房的窗子没有窗帘，所以这里有一股被晒热的漆布气味。电话费通知单从小方桌上掉到地板上了，卷成圆筒状的通知

单被晒黄了。

每次从国外归来，他都觉得自己在远方住了好久，过的不是真正的，而是虚构的逢场作戏的生活。他被这种逢场作戏弄得疲惫不堪，很需要通过跟亲朋好友们谈谈话，来摆脱掉那种不断地参加鸡尾酒会的充满夸夸其谈的饭店生活方式，这是他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过的生活方式。同时，这种生活也使他的虚荣心和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现在，他想洗去自己身上的倦意。这倦意是精神负担，也是装腔作势。它是由自己的微笑、炫耀智慧的夸夸其谈和外国香皂引起的。他还想洗去外国香皂那种故意使人想到女性美的香气，洗掉化纤制品的化学气味，这气味曾充满巴黎电影放映厅和旅馆的房间。他要洗掉经历过的一切。

淋浴的凉水细雨般冲洗着他，细针似的水柱落在他身上。哗哗的水声带来了春天的清新气息。卫生间的门敞开着，空荡荡的住宅里似乎回荡着海涛的回声。他赤着脚在各房间里走着，用浴巾擦着身体，在暖和的镶木地板上留下了脚印。还没穿上衣服，他就走进餐厅大声地说：“好啦，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正在过去。”他斟了一小杯白兰地，一饮而尽。感到一阵灼热之后，他似乎轻松了些。

后来，他躺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翻阅着从塞满邮件的信箱中取出来的杂志、报纸、邀请他参加会议和展览的各种请柬。他整理了一下信件，但没读信，只看了看发信人的地址，希望看到一个熟悉的姓名。他突然一怔，把一封浅蓝色的信不慌不忙地放到茶几的一角。信封上那个他从未见过的机关图章十分醒目地映入眼帘：“内务部总局”。这封信立即引起了他的惶感和不安。

“这么说，又开始了……说准确些，是仍在继续？”克雷莫夫迟疑了一下，打开信，匆匆地看了一遍。信的内容是：他，克雷莫夫·维亚切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须于七月四日（也就是三天以后！）

到下述地址找预审员托卡列夫，并应随身携带护照或个人证件。地址：彼得罗夫卡街三十八号二楼二〇〇室。“有什么必要去第二次？在制片厂我同他已经见过面了。是啊，托卡列夫·奥列格·格里戈利耶维奇，一位留着整齐的小胡子的年轻人，很有教养，也很聪明。但是，不管我会遇到什么麻烦，我就是不到彼得罗夫卡街去，亲爱的奥列格·格里戈利耶维奇。我不愿意您也成为已经发生的那件事情的阴影。”

他心事重重地把通知书放到一边，开始浏览评论巴黎电影节上映影片的文章。他觉得，刚才自己的想法是自欺欺人，同时又觉得，那篇评论自己的影片的文章是庸俗的曲解。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上的纯洁同内心世界空虚得像空贝壳一样的西方主人公的残忍”进行了天真的对比。

“我们这些评论家弟兄可真够机灵的，不过，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可怜的愚蠢手法呢？”克雷莫夫竟气得大笑起来，他清晰地想起了那位著名美国导演的胖脸。那位导演的父亲是俄国人，他才华横溢、谈锋犀利，在电影节上展映了自己的影片《索多姆和戈莫拉》，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影片讲述的是一所精神病医院毁灭的故事，它是失去了同情心的人类灭亡的象征。“我的这位同行约翰·格里奇马尔也可能同我一起大笑。‘纯洁’、‘道德’、‘高尚’——这些词儿滥用到了何等地步啊，我的上帝。我们用这些词儿辩解，保护自己，用它们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了。我们这些天之骄子，自以为天使般圣洁，目空一切，把一切罪恶都留在山岭的另一边。”

读另一篇文章时，他更加愤懑起来。在这篇文章里，又出现了唠唠叨叨的大话，大谈约翰·格里奇马尔的影片中的性和病态心理，以及道德沦丧等等。没读完，他就把报纸扔到一边，大声说道：

“痴呆症，见鬼，痴呆症……”

他曾同格里奇马尔一起获奖、一起被邀请参加午宴（两个超级

大国的两位导演)。每晚看完影片之后，他们都在旅馆的酒吧里会面，一见面就互相请喝威士忌和伏特加，而且都喝得过了量，虽然要想在酒量上超过这位美国人是不可可能的。有两个晚上，格里奇马尔请他到夜总会闲聊，每次争论的都是俄罗斯的命运问题。他俩争论得彼此都感到不快：立场的对立把他们隔开了，同时又有某种东西把他俩联合在一起，这也许是双方都有的强烈的好奇心吧。

在夜总会度过的第二个夜晚特别使人感到疲倦，因为他俩争论得很厉害，酒也喝得很多，表演的节目也很有刺激性。第二天早晨，在观摩影片之前，克雷莫夫有点头痛，在旅馆大厅里翻阅着摆在茶几上的《巴黎竞赛》杂志。他暗自祷告，今天最好有点什么事情能让他躲开酒会和系紧的领带，以及格里奇马尔的那些恶毒的刻薄话，最好能让他休息一下，喘口气，逍遥自在地逛一逛傍晚时刻的巴黎街道。旅馆的大厅十分宽敞，具有不是法国式的，而是东方式的豪华气派。大厅里铺着厚地毯，各种各样的镜子体现了美国式的奢侈派头，这里放着宽大的沙发椅和红色人造革长沙发。旅馆职员办公桌前，人们进进出出，走来走去，小声地交谈着。空气中有一种雪茄和香水的气味，苦涩中夹杂着香甜。这一切都是克雷莫夫在别的国家也曾多次见过的、是旅馆中的寻常景象。他时而观察着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制片商和导演们的面孔，这些面孔有的刮得极其干净，有的留着络腮胡子（这都是现代世界上常见的脸型），时而望着那些影星，望着无名的名流们像运动员一样挺直的腰板，他们体态优美，他们年轻，或许显得年轻，他们那显得过于炯炯有神的眼睛流露出夜生活的痕迹。不过，某种东西在妨碍着他进行习以为常的观察，也许因为现在他有点头晕，也许因为那些镜子太亮了。这天早晨，他在宽敞的大厅里看见了所有吃过早饭后走进来的人。一想到这些人可能同时发现正在观察着他们的自己的目光，克雷莫夫竟突然冒了一身冷汗。他把自己的目光转到《巴黎竞赛》杂志上，同时他听到了人们的笑声，人们用傲慢和嘲笑的口吻说的那

些关于他的话，人们说到他的无礼的好奇心，说他没有权利利用这样好奇的眼光打量别人，于是他立即觉得，好像自己的脸被别人打了一下似的。他不看杂志了，他抬起头，发现在那群制片商和电影导演中间有一个人正在平静地凝视着他。看上去，此人很面熟，他两鬓花白，穿着一件灰上衣。他曾不止一次见到过这个人。“我认识他，但他是谁，是谁呢？”如同置身于拥挤的人群当中，他不时地伸长脖子寻找那个人，逐渐看清了他的发型、前额、花白头发、领带；他很想用目光同那个人打招呼，但站在远处的那个人并没有理他，只是躲在暗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朝他这边望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十分虚弱，冒了一身冷汗，他甚至担心自己的心脏会停止跳动。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毫无疑问，幻觉的起因是神经过于紧张，他听说过，干他这一行的人有种种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但他从未体验过这种症状。“岂有此理，愚蠢，胡闹！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把杂志往茶几上一扔，用战争时期他所具有的那种果断劲儿，迈着坚定的步子径直朝站在一群制片商和电影导演当中的那个人走去。然而，那个穿灰上衣的人已经不知去向了……而站在那里的竟是法国导演克洛德·梅利叶，这是一位爱打扮的轻佻的瘦老头儿，他的短睫毛是染过的，他用社交界彬彬有礼的姿势向克雷莫夫鞠了一躬，刚洒过花露水的头发还是湿润的，秃顶上的几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克雷莫夫也不知为什么朝他鞠了一躬，费力地说了一句法语：“您好，先生！”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窘态，绕过这位法国导演，朝大厅的另一端走去，进了酒吧间。在这里，一如既往，他看见了约翰·格里奇马尔，这个美国人高兴地朝他摆了摆手。此时此刻格里奇马尔的到来无疑是给他解了围。“啊，我很高兴见到你，维亚切斯拉夫！”

一天以后，类似的情况又在飞机上出现了。克雷莫夫一上飞机就觉得每天都使人精神紧张和消耗精力的外国的一切，以及与此有关的五光十色的生活都顿时结束了。在祖国的民航飞机中，在空

着一半座位的机舱里，同可爱的空中小姐们在一起是令人心情舒畅的，他又听到了俄国话。不过使他惊讶的是，在这九千公尺的高空，竟有两只苍蝇在玻璃窗上爬来爬去。苍蝇在阳光下全身金光闪闪。舷窗外是一片大冰块似的白云，卷起的白云如同粘在一起的一块块巨大冰团，凝然不动，下面是平坦的云层，望下去犹如北冰洋，而在难以置信的云缝深处，勉强可以望见淹没在海底的城市、细如发丝的公路、黑压压的森林。

克雷莫夫望着一簇簇大冰块似的白云和玻璃窗上爬着的两只苍蝇，开心地想，在这惊人的高空中、雪白的云层与两只苍蝇之间有着一种多么不协调的关系，这两只苍蝇不是在舍列梅季耶沃机场，就是在奥尔利机场飞到机舱里来的，它们是怎样飞进来的呢？为什么飞进来呢？

当他在想着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和必不可少的“为什么”的时候，他很高兴，也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从客机里抬出来了。他离开了这个金属载体，离开了自己坐的沙发椅（不过在空中他仍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他看见自己在白色的云海之上飞翔着，这云海一望无际，亮得耀眼，和风习习，阳光灿灿。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服着自己，想尽办法来解释自己的这种状态，“这是在我的意识中实现了的一种幻想。我一直想拥有一架只有一个座位的直升飞机。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有时很想离开一切人，飞离地面，漫无目的地飞呀飞，降落在夕阳余辉中神话般的林中草地上。在幽静的森林里，有一泓湖水……但是，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不久前我在旅馆大厅里看见了自己，这是个游手好闲、衣冠楚楚、善于在创作中表达他人的情感、但在异国却是个多余的人。于是我就六神无主了……我现在怎么会有一种飞翔时风吹在脸上的感觉？为什么我胸中郁闷得如此难受呢？我完全脱离了物质世界了吗？”

亭亭玉立的空中小姐穿着长筒靴，手端托盘，摇摇晃晃地走到